



第 一 章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 关于 三次社会大论战中的经济学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 向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的转变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前的 中国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端于 19 世纪 40 年代，于 19 世纪 60 年代基本形成，并随之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使欧洲工人运动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经济理论传入中国却是在它问世的近半个世纪之后，这除了当时还处于相对隔绝的世界环境外，与近代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它妨碍着中国社会同外部世界的正常联系和外来新思想的接纳。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

近代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已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

的社会。在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的闭关锁国的经济落后状态。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势力的入侵，使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统的封建经济关系被彻底打破，原有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并逐渐深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内部，强占港口租界，把持海关关税，开设工厂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财政，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着主导地位。

原有封建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冲击下，虽然已处于日趋衰退的状态下，但仍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单一的封建制度经济在中国虽然已经瓦解了，但封建租佃关系在农村依然存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已遭到了破坏，但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依然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它们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的盘踞着，与外国的侵略势力相勾结继续维持着对广大中国农村的半封建的统治，阻碍和束缚着中国农村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刺激下和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日益衰败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但它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只是为自己的发展造成着某些条件，并不是要使中国发展成为独立、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使它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停滞的和半停滞的经济落后的状态，以便使其能更好地成为外国资本势力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成为它的经济附庸。

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特有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服务的。它通过利用已经把持

的政权大量贪污和侵吞中国社会巨大财富，垄断和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打击和束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有着明显腐朽性和反动性。它的存在和发展进一步加深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

以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为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虽然是一种新式的具有进步作用的经济，但由于它只能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长，并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压抑和排挤，步履十分艰难、力量十分薄弱。它既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无法解脱的深刻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很难在中国独立发展起来。

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它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和剥削下日益贫困破产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这种以最简单的生产条件来维持生计的个体生产方式又在中国土地上广泛地大量地重复存在着。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除了少数可以转变为近代工厂的雇佣工人外，大多数仍只能留在农村、小镇继续成为破产和半破产的佃户、雇农或小手工业生产者。这是他们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存在的唯一条件。

总之，在近代中国诸多的经济关系中，帝国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起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的经济关系，而农民手工业者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则是具有发展前途的有利于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既相矛盾又相影响，组成中国社会极为复杂的经济网。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致概况。

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必然带来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是一个单一的封建社会，社会内部的关系比较简单，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其它关系都是由这个关系派生出来的。社会的矛盾也主要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原有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便有了一定的改变，即在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大众的矛盾之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使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并相互交织在一起。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造成封建主义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一面，同时也造成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矛盾的一面，从而形成了封建统治者内部抵抗派与投降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和中国自身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又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又有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性质不同，无产阶级同他们的关系也不同。而在同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由于经济地位、经济利益和经济性质的不同，又有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关系中，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和手工业的日益破产，又加入了地主工商业者与地主高利贷者同农民手工业者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与农民手工业的矛盾和城市民族工商业者与农民手工业者的矛盾。此外，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中国，又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反动军阀内部官兵上下级的矛盾，反动军阀政府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等等。在这众多的社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的矛盾，同这个矛盾直接相联系的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其他矛盾在这个时期都只

是次要的矛盾。由此在整个中国形成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十分奇特的矛盾网，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这就是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本概况。

二、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经济主张

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必然带来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上不同的经济主张，由此形成近代中国社会在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代表着不同经济关系、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出發，提出了各自对中国改造的不同经济方案。

早在近代初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就提出了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和进行国内某些财政经济改革的要求，以巩固国防，改善封建国家的经济状况，增强封建国家的实力。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为彻底查禁鸦片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就十分注意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派人翻译西方书报，主持编写《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书，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和風土人情，提出睁眼看世界和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等主张。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的基础上，又增补编辑了《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明确地回答究竟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移植西方新式工业的主张。他的思想在近代历史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林则徐和魏源还提出了抑制土地大量兼并与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认为这是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国家财政的重要途径。但他们的这些主张只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极少数，同时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剥削制度本身及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无法克服封建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的弊端，这自然也

就无法为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找到出路。

在鸦片战争后剧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斗争中，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对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也提出了一套主张和设想。在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作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洪秀全就代表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个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纲领同时还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等等多方面的改革主张，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纲领本身所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严重缺陷，所以根本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只能成为一种空想。太平天国后期当时总领朝政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又针对当时情况提出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新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它离开和忽略了当时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及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迅速逆转这样一个现实，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它受到农民本身的局限和最后革命的失败，所以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来真正地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发展找到出路。经过太平天国革命后，封建的土地关系仍如一张严实的网继续笼罩着中国的广大农村。

作为中国近代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冲破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也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提出了自己的各种设想和主张。19 世纪 70—80 年代以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就主张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呼吁清政府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则主张“除弊兴利，实行改革”倡导实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这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提出的最初

经济和政治要求。

到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又进一步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制度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挽救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只有民族工业发展了，风气才能改变，民智才能开启，民众才能从愚昧守旧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走上富强之路。为了更好地振兴中国经济，他们提出必须以近代工业作为立国之本，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率先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口号，而要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又必须要全面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资本的输入，使民族工业成为民族商业的强大基础。为此目的，他们还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邮政铁路系统等等。

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充分反映了在中国历史上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统治，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强烈的愿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进步的作用。但以康有为等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进行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是不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权和这个政权所赖以存在的封建土地制度，他们把变法维新成功的希望只寄托于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身上，不敢与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的决裂，表现出他们在本质上的软弱性。所以维新变法运动虽然轰轰烈烈，而最终不能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而他们所倡导的经济改革运动也不能不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便相继接踵而起，他们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等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改革内容。

所谓“平均地权”，就是以资产阶级的国家土地所有制代替

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其实施的办法不是无偿没收地主土地，而是向地主征购土地。同时在实现土地国有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使农民获得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土地，所以不能动员大多数农民起来参与改革和进一步去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后来孙中山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便提出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代替“平均地权”主张，但仍然用的是和平的方法，而即使是这样一种不彻底的政策，在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也并未得到实现。

所谓“节制资本”，就是在普遍地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同时，还要防止私人垄断资本的产生，及其对中小资本的排挤，以免造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其措施之一就是要对私人资本的发展进行一定程度的节制，防止其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对中小资本的压制和排挤。其二是要发展国家资本，凡属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和重要部门，如银行、铁路、矿山、电力等，“悉归国家经营”，“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以便借助国家力量来更好地发展民族资本，抵御外国资本的压迫，使中国独立富强。

所谓“振兴实业”，就是充分利用国有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此，1919年孙中山还拟订出一个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蓝图——“实业计划”，提出以交通运输为起点，以农业、矿业、钢铁业为重点和全面发展实业的措施与规划。凡个人可以举办的就由个人举办，国家立法给予保护，并给予指导和奖励。个人无力兴办的或不宜个人兴办的，皆有国家兴办经营。还提出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无技术，即用外国技术等积极向外开放的政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和措施，虽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上述各种经济思想中最进步的一种经济思想，其中还有不少地方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仍有参考价值，是一份非常可贵的遗产，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

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主要只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他们的社会经济力量和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也无法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相抗衡。所以，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想要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改革方案来改变当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状况，变更中国经济的落后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百多年来，近代中国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冲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进行着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提出的各种发展民族经济的方案最后都失败了，都没有找到可以救中国的科学方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在受到了多次冲击后，仍然保持着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因此推倒桎梏着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生产关系的历史任务，不能不最后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 最初传入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它是同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学说一起传入到中国来的。早在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对于地处遥远的东方，而当时又十分封闭的中国来说，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鲜为人知。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已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传播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而马克思主义被较为广泛地传入和介绍到中国则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其最初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最初传入

马克思的名字及其经济学说的概念出现于中国，最早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1898年夏，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英国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一书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的中国书名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提到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于该书的发行量极为有限，所以影响不大。

1899年2月，李提摩太又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物上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颌德所著《社会的进化》一书的前四章，中文译名改为《大同学》，文中又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和理论，但其中混杂着许多宗教思想，所以很难真正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正确介绍。

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他在1902年10月（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首次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①1903年，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又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②但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和后来的保皇党，他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理论。

1903年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的不断深入，中国思想界开始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其中包括着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片断。这些书大多是从日文翻译过来，因为当时日本风气开化较早，出版西方文化书籍较多。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二册第101页。

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专门列有《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的一章，以一万多字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一大经济学者；同时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源于《资本论》，与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异其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当时介绍国外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中，留日学生马君武的文章比其他文章内容更广更深。他在1903年2月《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中说，马克思是“以唯物论解说历史之人”，与庸俗进化论相比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更高明，因此凡热心进步的国民不可以不研究。文章后面还附录有马克思著作的书目，包括有：《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还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错列为马克思著作。这是当时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开列出来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书单，其中就有三本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

在当时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报）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从1905年起，《民报》陆续多次刊登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在这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在1905和1906（民报）第2期、第3期上连续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对马克思生平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详细和全面的介绍。同时还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在介绍《资本论》时，他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最主要著作，“马尔克（即马克思）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其学理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

至今不衰^①。1912年朱执信还在《新世界》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文中还对《资本论》内容作了一定篇幅的专门介绍，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第一篇对《资本论》作出过专门介绍的文章。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过重要介绍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早在19世纪末流亡欧洲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对这些理论进行过称赞。他称他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0月他在上海社会党总部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中，还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作出过高度的评价和阐发。他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因而对社会主义之研究不可以只去迎合一些粗浅的言论，而不去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如《天义》、《新世纪》等也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在1908年（天义）16至19卷合刊本上，刊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等观点，但总的来说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宣传的范围，且与无政府主义观点相联系，因而未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

总之，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已在中国开始有了初步的传入，但当时这些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的人，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真要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

①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载《民报》1906年2号。

抱着各自的目的来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零碎的、粗浅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准确的、被曲解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虽然已有了初步的传入，但并不可能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

二、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早在远离十月革命很久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传入到了中国，但那时即使是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极为有限的，他们都是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才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而那时他们学习的重点还是西方。但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一些人逐渐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困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途和方向，使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的亲切而富有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从而开始把目光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转向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于是在中国便逐渐形成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观点来考虑中国自己问题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力传播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才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比较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初步形成了一股宣传和学习的热潮。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第一个站起来对十月革命进行热烈称赞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的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当时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李大钊。他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不久的 1918 年下半年起便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和理论，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变革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这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想。1919年5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时，他重点介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他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①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社会生产关系也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否则必将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时，他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理论，指出剩余价值来源的秘密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而所谓资本积累，不只包括着对小生产的剥夺，同时也是对中级产业主的剥夺，是把一切资本集中、聚集于少数资本家手中，因此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必然造成少数资本家工厂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将不可避免。在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他重点介绍了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阶级斗争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原因，历史上一切宗教的、政治的斗争，“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② 李大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介绍尽管还有许多不全面、不确切的地方，但它是当时能够作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最完整系统的解说。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② 转引自《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5、126页。

此后李大钊还先后在《每周评论》、《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多种刊物上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批判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他不仅通过频频著文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利用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积极购置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为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社团提供研究和学习的便利，并在《晨报》副刊开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此外，为了更好地帮助青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李大钊还积极创建进步社团并参与他们的活动。1918年6月他与新闻界人士王光祈联合留日归国学生组成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李大钊又与邓中夏联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该会还在李大钊的直接关怀下，创办了一个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斋”为英文 Communist 的谐音，意为共产党人。——作者注）的小型图书馆，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馆有英文版的马列著作约 40 多种，中文版马列著作 20 多种，其中属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围的就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等。为该会成员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创立这些进步的社团之外，李大钊还应邀到各社团发表演讲，积极引导和帮助这些进步的团体学习马列主义，扩大马列主义及其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在中国初步传播作出了不朽贡献。

在这个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陈独秀。陈独秀虽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发表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门文章，但他在批判当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中阐明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如 1920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谈政治》的文章，就阐明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生产与分配的原理。由于陈独秀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加之又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他在舆论界的

地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及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作出过重要贡献，这就是李达。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认真阅读和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过《唯物史观解说》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6月他又两次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目的》的文章，不仅根据他当时的理解，简要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目的，指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消灭私有和剥削，还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时，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和所有制关系等经济特征；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才能协调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按劳分配。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必要的宣传。1920年，他到北京后又参与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还担任了处于半秘密状态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作过许多宣传。虽然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分析还不够准确，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因而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

此外，这个时期还有学术界的一些其他人，他们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1919年5月由管力翻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开始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译文题为《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同年6月11日又有柯祖基翻译的考茨基所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在《晨报》连载，译名定为《马氏资本论》，它是当时中国一本较为系统介绍《资本论》的译著，虽然考茨基的这本书有着自身的很多缺点，但它对帮助中国人了解《资本论》，扩大《资本论》在中国的影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1920年10月又有费天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自序》的译文在《民国》杂志第2卷第3号上刊出，还

有这个时期王统照翻译的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经济与政治》一文，也在北京青年学生创办的《曙光》杂志 2 卷 1 号上发表，译名为《过渡时代之经济》。如此等等，它们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经济学说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已得到了初步的较为广泛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过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政府的阻挠及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对。正如列宁所说：它生命的旅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过程中，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也经历了思想理论界三次社会大论战。

第三节 中国五四时期思想理论界的 三次社会大论战

五四时期思想理论界的三次社会大论战主要是关于中国应实行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的论战，亦即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但它也涉及到许多经济学问题，因而也是一场关系到经济学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一场关系到用什么观点来改造中国的论战，它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胡适首先挑起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学派杜威的忠实信徒，1919 年杜威来中国讲学时胡适就积极配合在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 年 6 月，胡适利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返乡、他把持《每周评论》编辑大权的机会，连续在该刊第 26、27 号上刊载杜威讲演录，并在 7 月